

黄裳

故人书简

海豚简装



NLIC2970882582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黄裳

故人书简



海豚简装



NLIC2970882582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人书简 / 黄裳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10-1281-4

I. ①故…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8850号

书 名: 故人书简
作 者: 黄 裳

责任编辑: 李忠孝 张菱儿 李宏声
封面设计: 蔡立国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10毫米 × 1020毫米)
印 张: 8.62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281-4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二〇一〇年八月，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海豚书馆”与读者见面，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海豚文存”“祝勇作品”“独立文丛”等丛书，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目前，“海豚书馆”已有六十一种，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每套丛书，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我社从上述丛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重

新设计封面，以平装形式出版，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海豚简装”。首批出版五种：董桥的《墨影呈祥》、余英时的《人文·民主·思想》、张大春的《离魂》、林行止的《远游·鹅肝·松露》、黄裳的《故人书简》，我社还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目 录

- 过去的足迹
——吴晗纪念 (1)
宿诺 (35)
答董桥 (45)
叔弢先生二三事 (47)
弢翁遗札 (53)
忆师陀 (59)
阿英的一封信 (66)
忆郑西谛 (70)
故人书简
——叶圣陶书二通 (77)
故人书简
——怀念叶圣陶 (83)
槐痕 (102)
忆俞平伯 (108)
润例及其他 (127)
王剑三 (133)
忆李广田 (142)
钵山一老 (149)

涉园主人 (156)

卞之琳的事 (171)

故人书简

——钱锺书十五通 (180)

故人书简

——沈从文 (201)

跋永玉书一通 (207)

故人书简

——忆汪曾祺 (213)

关于王昭君

——故人书简·忆汪曾祺 (232)

也说汪曾祺 (240)

曾祺在上海的时候 (257)

黄裳和他的《故人书简》 (263)

过去的足迹

——吴晗纪念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一篇纪念春晗的文章。可是几次起了头，都不能继续下去。这使我非常苦恼。我有一大堆话想说，可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才好。几十年来春晗送给我的十来本著作，手边一册都没有剩下，最近才设法借来了几本。翻看着这些零落的遗文，引起了更多杂乱而又鲜明的记忆。这就使我本来已经十分纷乱的头脑更加纷乱。不久前，被抄家抄去的书物发还了一部分，从这中间意外地发现了春晗给我的二十几封信。这些被看作“反动罪证”的信件被扎得好好的，上面还留下红笔的批注和摘

要。重看一遍，三十多年来的旧事，一件件更真切地在眼前浮现。如果说历史真的是一种重载的话，这负载此时就变得更为沉重了。

我想还是必须从这纷如乱丝的往昔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想起了一九四五年秋天的昆明，想起自己当时曾经写过的一篇《昆明杂记》。那是一篇幼稚而可笑的文章，不过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对自己的“少作”表示厌弃。我想起了它，因为它曾反映出那个时代一个年轻人的心情。而现在，却正需要一把这样可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

我记得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赞美过昆明可爱的秋天，从古老的柏树枝柯中间漏下来的日影，澄蓝的天空和想象中的鸽子呼哨声。我记得着手写这篇文章的地方是在西南联大外面一个用草席搭起的茶馆里。正当我出神地用笔赞美昆明的秋天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小女孩刺耳的哭声。她是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打中了，满身流着血。我甚至连那枪声都没有听见。这真成了一种绝大

讽刺。残酷的现实将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拖了回来。我的白日梦破碎了。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多月以后。我从贵阳回到昆明，正在等车到重庆去，暂时寄居在联大朋友的宿舍里。为了打发行前的日子，我访问了昆明的一些历史遗迹，想写一篇谈论南明历史的小文。就在那个茶馆附近有一个莲花池，据说就是三百年前一个有名气的女人陈圆圆自沉的地方，池边还有着两块刻了她的遗像的石碑。此外还有一块更小些的碑，它指出的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捉回来杀死以后，焚尸扬灰的所在。

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不大能够理解当时人们对南明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了。这当然不只是出于我个人独有的“历史癖”，我想写的也并非一篇怀古的文章。我的历史知识浅薄得很，跑图书馆也得不到什么帮助，连一部吴梅村的集子也没有借到。只能靠两条腿跑来跑去，从人们的嘴里打听一些传说。我知道在联大就住着一位研究明

史的吴晗。我还是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名字了。不过那时人们大抵都只知道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联大的进步教授中，和闻一多一起，是两面旗帜。我从他近时发表的《旧史新谈》和其他一些论文中间，知道他并不曾放弃自己的专业，他还在继续运用这个武器为一个神圣目的而勇敢地战斗着。我很想去访问他，向他请教。可是只给他写过一封信，没有能见面。

就在那次听了两夜枪声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昆明，来不及听到“一二·一”扔在联大学生群中的手榴弹声，和向李公朴、闻一多身上射去的枪声了。我带着没有写完的原稿来到重庆，在扬子江上完成了它，暂时收起了对南明史事的依恋，开始了新的生活，学习做一名记者。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我成了一名编辑。当我开始为报纸的“文教版”设计版面、组织作者时，我又想起了吴晗，就写了一封信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去，希望他给这张报纸以支持。我没有忘记他

的《旧史新谈》，我深信这依旧是一种有效的新颖的斗争武器；并且相信，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的新闻版面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回信很快就来了。他热情地给了报纸以支持，还介绍了他的学生给报纸写稿。他对《旧史新谈》表示了特殊的兴趣。在回信里说：“……更愿续写《旧史新谈》，后者我一厢情愿，想每个月写一两万字，几百字一则，每天抽半个钟头写，而且，希望一星期内就能寄上……”

我从通信中知道了他回到北平以后的一些生活片断。也许我又曾向他打听过一些有关明代历史问题吧，他在回信中即使是谈论着别的事情，最后也总是不忘记讲点历史故事，他曾提起在徐达病危时，朱元璋给他吃蒸鹅的故事；还开给我一些明代野史的书目。我仿佛看到一个读书人多么希望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却不能不被时代的风暴卷上街头，我看到他的挣扎，也看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几乎相同的挣扎。

写文章是愿意的，困难的是别人不把你当

作可以写文章的人，被安派作太多自己才力所不够作的事，于是一方面疲精劳神作牛马，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又颇想偷闲动动笔墨。成天要接见许多生疏然而热诚可爱的面孔，说太多自己也记不起来的话，有时候还得被牵上讲台，被挤上游行队伍的前排，如此如此，就永远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读自己该读的书。然而，又能怨谁？只怪自己是生在如此一个时代。

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说：

有人说我钻进旧书堆发掘新史料。其实，硬了头皮也还是钻不进去，定不下心，只是站在书堆外转转圈子，叹叹气而已。成天作准备读书、准备拿笔状，读不下，写不出，话却说得不少。如此，如此。

我想，这就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吴晗。我不想把他描画成一个天生的革命者，虽然在那几年中间，他的工作，如他在通信里所说，已经大大偏离了一个正规学者的轨道。他走上这条必然的斗

争道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容易的。在这同时，闻一多、朱自清，还有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也正走着一条基本相同的道路。吴晗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里说到他们在昆明时的斗争生活，其中有这样的话：

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的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这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

当他们发出这种几乎一致的喟叹以后，就更紧迫、更不顾一切地工作，战斗了，目的是想更快地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人们能安心地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为建设祖国而尽力；也使自己能早日回到书房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在斗争中倒了下去，他们自己没有能够看到美好理想的实现，但却为旁人铺平了路。过了二十年，

一场更为残酷的斗争风暴起来，当年的幸存者，又有不少人倒下去了。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但方向则是一致的。今天的幸存者在接过先行者手中的火炬时，不能不要求自己更清醒，比他们的前辈、伙伴想得更深，准备得更为充分。是的，历史要求人们不能不这样，也规定了人们必然要这样。路从来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吴晗三十年前一句无意的牢骚，在三十年后重读，不能不引起更深的思索。“有人说我钻进旧书堆发掘新史料”，什么人说的呢？他没有讲，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背后包含着怎样的含义，我看他也没有细想过。今天看来，难道这不就是三十年后风行一时的“影射史学”的原始形态吗？有些致人死命的病毒的细胞，往往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潜伏在人体的什么地方了，什么时候诱发，并恶性发展，则由新的客观因素所决定。

看来这好像又是一条严酷的客观规律。

现在我应该讲一点儿和吴晗相识的经过。

他是我尊敬的一个前辈。一九三七年他就是

清华大学的教授了，那时我正是一个中学生。我从一九三三年创刊的《文学季刊》上读到他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这篇论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倒不为了他研究了一本“不名誉”的小说，而是出于另外的原因。据吴晗后来对我说，当时一位高年资的教授曾对他说，你研究《金瓶梅》倒也罢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研究什么时代背景呢？可见离经叛道的毛病并不出在研究什么，而在于研究方法。从一本小说可以看到晚明那个时代的侧影，这个方法确实很新鲜；他的文字也很新鲜，不大引用古老艰涩的文献。这许多，都和当时流行的历史学者的论文很不一样。可是后来我又知道，文章的通俗并不归结为内容的肤浅。这个年轻的教授是读过许多书，抄过许多书的。在做学问时，他使用的基本上还是老一辈学人的方法。最初，我是从他那一清如水、极少引文的叙述后面的大量引书脚注知道这个简单的事实的。同一时期，我还在《清华学报》上读过他写的讲胡惟庸党狱、讲锦衣卫和东西厂

的论文。我对明史发生兴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在当报纸编辑时写信给他请求支援，也并没有经过谁的介绍，只不过是采取了新闻记者所惯用的简捷方法，不过我估计他大概不会拒绝。我的猜测并没有错。他为报纸组织了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的专页；他自己，还通过他的学生，供给我大量、丰富的有关北平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教授动向，知识界脉搏……的消息。有些上了版面，更多的则是没有见报的。不用说，通过频繁的通讯，也使我能够及时领会不同时期党的斗争方向。这在当时报纸工作中可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只要我想出了什么点子，需要什么文章、报道……他总是立即设法予以满足。伸来的不是一双手而是多少双手。这就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干得有恃无恐。今天回忆当年的工作和斗争，还不能不神往，不能不记起他的友情。

我在副刊《浮世绘》上写了一个《旧戏新谈》的连载，表面上是谈戏，实际上是一束杂文。不